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干部学习读本

JIAKUAIJINGJIFAZHANFANGSHIZHUANBIAN
GANBUXUEXIDUBEN

本书编写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发展低碳经济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区域结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崔宪涛 井 琪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干部学习读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干部学习读本》编写组.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35-4303-6

I. 加… II. 加… III. 经济发展—中国—干部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779 号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 话 (010)62805800(办公室)

(010)62805818(发行部)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目录

第一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001
一 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003
二 发展理论要求，转变发展方式核心是保持各种 经济关系的协调性	010
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 一场持久战	015
第二章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增强经济发展的 协调性	019
一 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021
二 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024
三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029

第三章	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047
一	科技创新是支撑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力量	049
二	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形成竞争新优势	051
三	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推动产业振兴	058
四	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061
五	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创新	063
六	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065
七	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067
第四章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073
一	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情况和特点	075
二	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面临的环境和任务	081
三	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对策措施	091
第五章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07
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	109
二	加大力度引导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111
三	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方向	115

第六章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129
一 为什么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131
二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与要求	136
三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点领域	143
四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151
第七章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161
一 我国外贸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163
二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166
第八章 发展低碳经济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177
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重大意义	179
二 发展低碳经济是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181
三 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能减排采取的 主要措施	185
四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	203
第九章 优化区域结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15
一 当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	217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221

三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	224
四	加大政策措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230

第十章	加快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237
一	体制机制不完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39
二	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245

后 记	254
------------------	------------

第一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刻不容缓

一、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发展理论要求,转变发展方式核心是保持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性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岁末年初是中国社会最繁忙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中央党校开展了为时5天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专题报告，规格之高，为近年少有。

每年的“两会”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生活盛会。在这次全国瞩目乃至世界关注的会议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重中之重的议题。无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乃至新闻媒体报道都聚焦于此。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今日的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但为了让转变发展方式真正贯穿今日中国发展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对转变发展方式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个理论的梳理。

一、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世界公认，我国这些年来的发展是高速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作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是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

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把全国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市场经济中，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

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就是说中国有多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没有了石油，就是一片死寂。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绝对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这是明摆着的，即便是美国政治家，也丝毫不掩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和俄罗斯谈石油、天

然气资源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 2004 年、2007 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 2003 年、2006 年 GDP 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的状况作了分析。2003 年中国创造的 GDP 占世界 GDP 不到 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 7.5% 的石油、27% 的煤、30% 的钢材、40% 的水泥等一系列资源。2006 年中国创造的 GDP 刚刚达到全球 GDP 的 5.5%，我们消耗了 8.5% 的石油、40% 的煤、40% 的钢铁、50% 的水泥等。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 2020 年占到全球 GDP 20% 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 85% 和几乎全球的全部其他矿产资源。到那时，即便是中国人想这样干，但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这些年，小造纸厂确实能换点钞票，大管子把废水排到河里面去；小水泥厂，能赚点钱，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腰包好像鼓了，但蓝天白云离我们越来越远，青山绿水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事情。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 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则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虽然破坏环境不应该，可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非常困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可能也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 20 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奥运期间连一些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

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但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两难中选择？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污染的发展，要经济，没有环境；要环境，没有经济。

与发展方式密切联系的还有发展战略问题。

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 13 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 960 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仅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 235 块钱，农民 73 块钱，收入差距比率为 3.22。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建立了新中国，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不论是出于国际主义考虑，还是战略考虑，我们都要进行抗美援朝。三年战争下来，我们欠了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遑论建设！可是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我们的人民，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真正开始缩小是 1978 年。1978 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

国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一下子就缩小到了 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 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历史最低点——1.72。从 1985 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 1990 年，基本上回到了 1978 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包括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 2007 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率达到了 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接近 2 万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目前每年生产 2000 万个，这 2000 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 40 美元，可是这 40 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在中国加入 WTO 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 20%，就是 8 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 37.5%——15 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

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要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钱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根本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得到的就是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什么叫比较优势。比如说有张三、李四两个人，张三特别会做衣服，他的比较优势是做衣服，一天能做5件衣服，又时尚又舒服。李四会做鞋，他的比较优势是做鞋，一天能做5双鞋，又耐穿又好看。但张三不会做鞋，李四不会做衣服。大家知道人又要穿鞋又要穿衣服。如果两个人不合作，那么张三花一天做了5件衣服，又花了5天时间做了一双蹩脚的鞋。同样，李四一天做了5双鞋，也花了5天做了一件难看的衣服。两个人一合计，为什么不合作啊？于是，张三专门做衣服，李四专门做鞋，结果都是6天时间，张三有30件衣服，李四有30双鞋，一件衣服换一双鞋，张三、李四各有了15件衣服、15双鞋。社会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张三、李四的福利得到极大的改善，靠的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合作。

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益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就是说，张三做件衣服的劳动可以跟李四做一双鞋的劳动进行等价交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上，他是不会弯腰

去捡的，因为弯腰的这2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将成为世界的最底层。

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从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就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但进展并不显著；原因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转变；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转变。总是一拖再拖。其实，这种依靠资源高消耗、环境高代价、经济低效益的旧有发展方式不仅越来越难以为继，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与国际争议。我们经济发展了，但资源越来越紧张；经济发展了，环境越来越恶化，生态越来越脆弱；辛辛苦苦好心好意给国外提供大量便宜的产品却被扣上倾销的帽子，而且国外还老拿汇率问题来压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不仅要转，而且要快转。

2009年以来，我们国家为了应对突发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采取了强力的保增长经济政策。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不免带有比较重的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子。现在来看，2009年的保增长非常成功。可是这一成功也给一些同志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以为传统的发展方式依然有效，甚至传统的发展方式还不错。这种认识误区在2010年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中有苗头性的显现，大家纷纷铺摊子、上项目，这种发展方式是很危险的。为了让2010年以及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党中央用高规格展示大决心，在岁末年初举办这样一个专题班，以端正认识，引导发展。

我们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要舍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形势困难的时候更要敢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加快、再加快。这是当代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前所未有地用了那么多的“加快”，仅新华社报道稿就用了50多次，充分表明今日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员令是何等的紧迫与严肃。

二、发展理论要求，转变发展方式核心是保持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性

从经济发展理论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现了这三个转变，就可以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而要实现这三个转变，关键是要保持相互经济关系之间的协调性。我们以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投资是经济运行的发动机，投资既是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又是使消费成为可能的坚实基础

谈到投资，我们首先要明白经济学上的投资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说法的区别。经济学上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和物品的生产，通过增加厂房、机器等这些资本设备来生产新的物品。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投资”，比如，投资了一套房子，投资了一支股票，只是一种财产转移的行为，是从原来财产所有者手中通过支付货币转移到了买家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实际资本。甚至从经济学来看，买房子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标准的消费的行为，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完成市场交易，进入了消费范畴。至于说你买的房子是用来居住还是“投资”，不是宏观经济活动要关心的内容。

也正是投资的这种本性,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货币、资本的直接投入,增加新的厂房、机器,刺激了对厂房和机器的生产,于是生产活动开始活跃;生产活动的展开又需要劳动,于是刺激了就业;就业者获得收入又会用于购买各种生产品;各种生产品的被消费,又会刺激更多产品的被生产。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越运转越快,越运转越活跃,越活跃就越繁荣。所有这一切的开始,皆源于投资这一经济运行发动机的启动。

具体来说,投资的这种经济功能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其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地位更为重要。

一种情形是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正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与建设阶段,正是由生产性投资推动快速增长阶段。世界许多国家在这一时期,都保持较大投资比重和较快投资增速。我国近十余年来,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较高、甚至比较高的投资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高投资率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9.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正是占GDP 50%左右的高投资率的支撑。

另一种情形是当出现经济衰退时,需要加大投资。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当经济的繁荣期结束,进入经济衰退期时,经济的活跃程度大为下降,生产开始收缩,消费也在下降,收缩的生产加速了消费的下降,下降的消费又加大了生产的收缩。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经济休眠甚至崩溃。而此时通过逆周期的加大投资,相当于为快要休眠的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可以让经济运行重新转动起来。我国从2009年以来实行的扩大投资政策就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一支经济强心剂。4万亿的投资规模,接近10万亿的信贷规模,保证了2009年中国8%以上的经济增长,让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一枝独秀。

更重要的是,投资也是消费赖以实现的基础。通过投资,经济活跃起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收入,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得起消费品;通过投资,大量的工厂厂矿建立起来,生产了大量的物品、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可供消费。如果没有投资的启动,提供收入、生产物品都是不可能的,消费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